

河南大学

的青青子衿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张清平 著

大象出版社



的
青青子衿

◎张清平 著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 / 张清平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347-4953-7

I. 河… II. 张… III. 河南大学—校史 IV. G649.28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8362 号

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

张清平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张 涛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 0371-63863551

印 刷 河南文达印刷公司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定 价 30.00 元

序

雷 颐

提起中国现代大学的创立、发展,人们自然会想起北大、清华,想起交大、北洋、南开、武大、厦大,想起燕京、协和、辅仁、圣约翰……更不用说已成“传奇”的西南联大了。在这一连串光华璀璨的“明星”照耀下,确实没有多少人惦记相形黯然的河南大学,更没有多少人去留心这所大学的历史和命运。

其实,河南大学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几所现代综合性大学之一。1912年,民国刚刚建立,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便在“七朝古都”开封成立。而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在清王朝覆灭前的1911年才刚刚成立。河南地处中原,传统文化深厚,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然而,因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战乱不断,更有旱涝频仍,昔日的“东京繁华”早已是“千年一梦”。然而,在经济、文化落后,风气保守质朴的河南,却建立起了中国最早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之一,进而成为全国最早的大学之一。

新观念、新知识的春风就这样冲破重重阻力,一点点吹进了中国的腹地。

倡导发起河南大学的,是当地一批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识之士,在对社会的《公启》中申明了办学缘由:“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因河南教育落后,人才匮乏,所以河南“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开办“预校”,就是要引进“西学”,以强省进而强国。“国之强,强于学”,如此简洁的几个字,便说出了国家强盛的“基本国策”。如果说饱学之士在当时有此识见尚属先驱,难得的是,其时的豫省政要也能认同此论、接受此议,在民国建立之初,政局动荡不安、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能兴办并不能迅速增强自己实力、政绩的大学。虽然后来政局一直不稳,权力更迭频繁,内乱不断,但为了保证教育经费不致中断,河大校方与省教育界多方陈情,促成了以全省契税专款作为教育基金。这一近

似国外大学基金制的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使当时河南大学的教育经费得以独立。民间与官方的良性互动,是河大成立、生存的重要因素。

然而,“国之强,强于学”毕竟只是少数精英所持之论,并没有成为普遍的认识。因为缺乏深厚的根基,所以大学的“命运”委实坎坷。在其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不仅不被认为可以强国,反而被等同于“落后”甚至“反动”。在这种大背景下,“文革”中包括赫赫有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内的几所重点大学被“赶”出北京时,都曾希望能在交通便利、离北京较近的郑州“落户”,却被当时的河南主政者拒绝。提及此事,当代许多河南人感慨良多。所幸,经历疾风暴雨之后,“科教兴国”又成为基本国策,与多年前的“国之强,强于学”,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河南大学选址于河南贡院旧址,那里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两次全国会试之地。按常理,会试应在京城举行,但京城的顺天贡院在庚子之乱时被焚,慈禧、光绪仓皇出逃,他们在开封行宫做出了在河南贡院进行全国会试的决定。于是,1903年的癸卯会试和1904年的甲辰会试得以在开封举行。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开封的河南贡院则成为这一具有1300年历史、给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体制带来深刻影响的考试制度的寿终正寝之地。在开封兴办现代新式大学,意味着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承前启后,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因其既有深厚传统,又得风气之先,虽然时间不长,河南大学办学成绩却引人注目。1927年,国民党开始执掌大权,对大学作统一规划管理,全国共命名了五所“国立中山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分别为前四名“国立中山大学”,而河南大学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除北大外(清华第二年改为“国立”),河南大学是当年北方地区唯一的多学科综合性国立大学。由此,可见河南大学在当时教育版图中的“分量”之重。从1912年建校,到1952年“院系调整”,先后在河南大学任教、任职、授学的有冯友兰、范文澜、姚从吾、刘盼遂、郭绍虞、汪敬熙、董作宾、杨廷宝、赵九章、李先闻、赵连芳、涂治、侯镜如、于秀民、王实味、邓拓、白寿彝、嵇文甫、赵俪生、尹达、王国权、任访秋、姚雪垠……

从1952年起,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的命运陡然生变。河大的农学院、医学院独立出去,搬到郑州分别成为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水利系调往武汉组成武汉水利学院,财经系调往武汉组成中南财经学院,畜牧兽医系调往江西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调往位于武汉的华中农学院。河南大学由

一所在国内享有相当声望的综合性大学,变成地方性师范院校,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1956年,河南师范学院又被“一分为二”,理科院系成为新成立的“新乡师范学院”的一部分;学校再次更名为“开封师范学院”。1979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科学文化知识重新受到重视,“开封师院”在这一年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随着学校建设的发展,1984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大学”的校名。30多年过去,从“河南大学”到“河南大学”,这段“更名史”却也与国史紧密相连。

河南地处中原,但在很长时间里,却是“文化”的“边陲”。研究中国大学的发展史,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那少数几所处于“文化中心”的“名牌大学”,而对如河南大学这样处于“文化边陲”的“非名牌”大学却少有眷顾,以致当我写作此序时,仍不得不以“北大”“清华”等名校作为参照来表述“河大”的地位与意义。所以,张清平这部“瞄准”河南大学历史变迁的书便格外有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名牌”大学毕竟少而又少,它们或可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却难以作为中国大学的“典型”。因为直到现在,仍然是这些“非名牌”的大学,承担着培养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的绝对多数。所以,河南大学的命运在中国的高校中当更具典型性。

学校的命运其实也是人的命运。因此在这部书中,更多笔墨倾注于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在作者笔下,人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融为一体。既有对历史、教育体制等“宏大叙事”的知性思考,又有对几十年来,校园中“青青子衿”们的衣食住行、教学、“运动”等生存状态方方面面细节的感性记述。近些年来,在许多关于中国大学的书中,对人的关注更侧重于种种充满悲喜剧命运的激烈变动,而缺少对教师、学生日常生活的记述、描写、研究。张清平在关注校园中人命运的同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观察、记述了当年大学校园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例如,描述了当时并不鲜见的“一头沉”(妻子因“农业户口”无法进城,不得不留在农村务农)老师的生活状况,当年大学生的饮食、服装、恋爱,校园文化……从“集体舞”到“交谊舞”到“迪斯科”,从学生们爱吃的菜肴,到校园生活如何一点点“多样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所典型的高校九十多年来的升沉起伏,更可感受到教、学其间师生们的悲欢荣辱、喜怒哀乐。

如今,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河南大学正在重振雄风,朝着一流大学的目标奋进。而当年的河大如何成为“文化边陲”中的一个亮点、如何在中国大学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确值得今天的河大乃至所有大学借鉴、思考。

序 / 雷颐

一、老河大的记忆 / 1-54

- 一、贡院碑 / 2
- 二、更名记 / 12
- 三、“我是景色,又是目光”
——河大校园中的老建筑 / 24
- 四、西迁记 / 32
- 五、迷人的数字 / 44
- 六、一窝野鸭蛋 / 48



二、当年的先生 / 55-154

- 一、校园里走出的“另类”人生
——记樊粹庭先生 / 56
- 二、海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记嵇文甫先生 / 74
- 三、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记李嘉言先生 / 90
- 四、遥忆当年榴花红
——记姚雪垠先生 / 102
- 五、命运多舛的人生
——记李白凤先生 / 114



六、遒劲的大树

——记任访秋先生 / 126

七、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

——记苏金伞先生 / 140

八、“笨拙”河大人 / 148

三、历史的拐点 / 155-192

一、青年圆舞曲 / 156

二、住在排房的老师 / 162

三、学四食堂 / 166

四、犹忆绿罗裙 / 170

五、一封情书 / 174

六、中文系老师速写 / 178

七、中文系同学语录 / 186

八、可爱的艺术系 / 190



四、七七级同学散记 / 193-255

一、同学之间 / 194

二、缩影 / 198

三、关爱和 / 202

四、李汴霞 / 208

五、李力 / 216

六、赵展 / 220

七、魏忠 / 224

八、刘彦君 / 228

九、曲令敏 / 232

十、田云 /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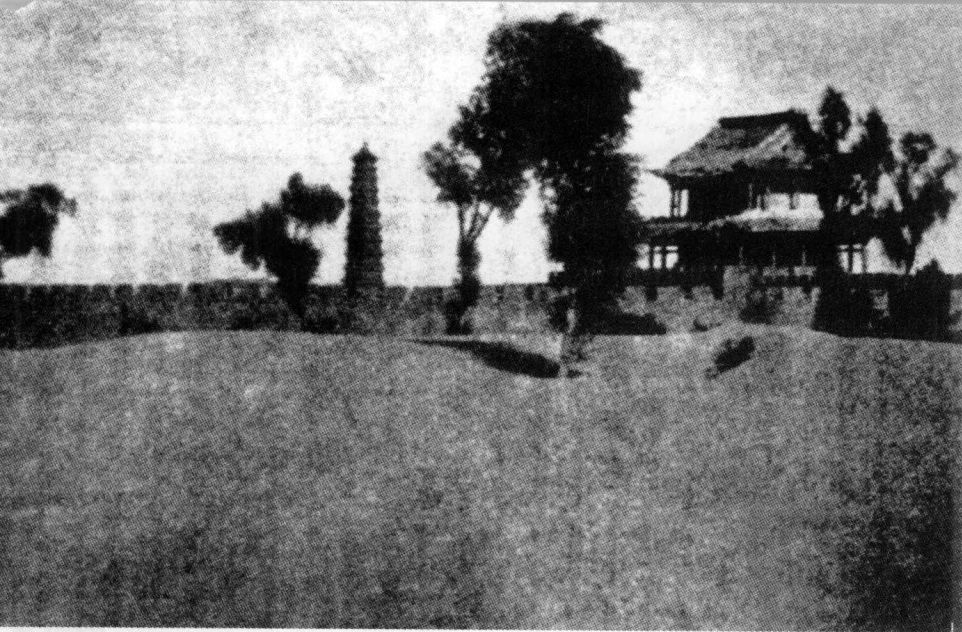
十一、乌云才茨克 / 240

十二、陈华光 / 244

十三、杨松林 / 248

十四、生命中黎明和青春的方向 /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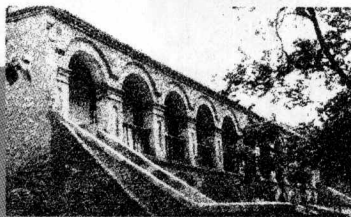


老河大的记忆 LAOHEDADEJINYI

老河大

◎ 老河大的记忆





无教士人在贡
院进进出出。
喜笑歌哭，宠
辱得失，举国
的目光牵绊着
这里。

贡院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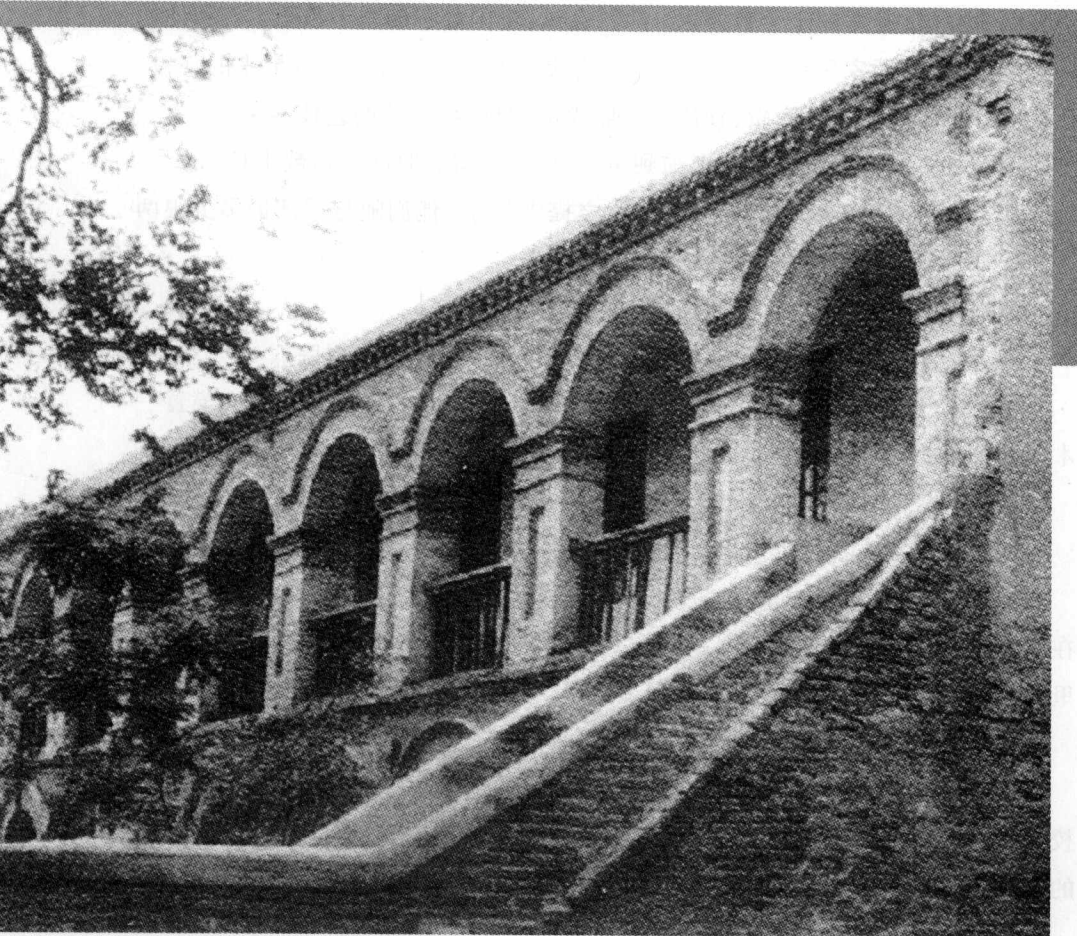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老校区主干道东侧，有两通石碑立在碑亭中。人们称之为贡院碑。河大老校区于清雍正年间始，一直延续到清末，为河南省贡院所在地。所谓贡院，是国家考试各地贡举人才的场院。那两通贡院碑，是中国最后两场科考在此举行的见证。

岁月更替，已逾百年。一代代河大学子朝于斯，夕于斯，弦诵于斯，游息于斯。教化之泽，深入人心，亦近百年矣。

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逃至西安。待事态平息，回銮北京时，慈禧一行在开封稍驻。

许是地方官员万般小心地接驾奉迎，颇得老佛爷和皇上的欢心。慈禧和光绪两宫钦定，1902年8月顺天乡试、河南乡试合并，在河南贡院举行。1903年2月及1904年3月的春闱、全国会试也在河南贡院举行。

当时北京礼部的官员，正准备重修京城颓圮残破的贡院。此事久拖不决，已商议多时。原因在于，朝野纷纷传说，修贡院不吉利，大明王朝因修贡院而亡国。



朝廷将两省乡试和全国会试考场定于开封的河南贡院,亦因北京的贡院多年失修,实在不堪使用。

于是,光绪壬寅、癸卯与甲辰连续三年举行的两科乡试与两科会试,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特别的科举考试。

说其特别,是因为积数年维新变法之倡导,这三年的考试试题以策论为主,废除了八股文。其特别还在于,这是中国最后的科举考试。

始于隋唐、延续了 1300 年的科举考试,从此成为了历史。

河南开封的贡院,见证了这段历史。

二

那是自宋以后,开封最后的辉煌。

两省乡试,赴考的士子数万人。两科会试,全国赴考的举子数千人。和他们一起到来的,有国家负责考务的官员,各路钦差大臣。还有应试者带来的仆役、伙计,随之而来的贩夫、商贾,钱庄、书铺,卖唱的优伶,卖笑的艺伎……

数万外乡人齐聚开封。从考前到考后,他们停留的时间长达数十日。

所有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需多少人为之提供服务?他们随身需携带多少银两才能保证考试期间的的生活所需?

运河码头,舟车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

原有的考棚远远不够使用,光绪皇帝亲自诏令,重修河南贡院。

上万间考棚一排排林立。每排20间,每间宽约4尺深约8尺。室中横置一木板为书桌,下置一木凳。考棚的门口悬有木匾,上书应试者的考号。

贡院的最南端,是一面影壁。春闹告示,一应知会,皆张贴于此。

无数士人在贡院进进出出。喜笑歌哭,宠辱得失,举国的目光牵绊着这里。

前清贡院留下的考棚,一直到“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立时,仍有一些保留在校园里。预校的学生有时会跑到这些“单间”里学习。他们犹记得,那些考棚里,尚留有当年士子们的笔迹:

“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

预校成立时,废除科举刚刚7年。7年前的考棚犹在,7年前的墨迹尚存。预校学生在前清的贡院学习声、光、化、电,朗声诵读外语,恰是当时社会新旧杂陈的缩影。

三

废除科举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不啻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无数读书人的仕进之途,是寒苦子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戊戌变法时,康梁也只提出“兴学校”,却未提“废科举”。当时的维新派人物反对的只是“八股文”。

自明以后的500多年里,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学子们十数年寒窗苦读,所学内容不外乎从四书五经到八股文。这一点,连康熙皇帝也很清楚:“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读书人对科举矢志不渝,趋之若鹜,实乃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前是一介寒儒,吃了上顿没下顿,抱一只鸡到集市上可怜巴巴地等待买主。可一旦中举后,他有了房子、土地、银子、奴仆,一向瞧他不起的老丈人胡屠夫也是前倨后恭,视他为“文曲星”。读书人哪

怕是考中仕途中最低级别的秀才,家里也可以借此改换门庭。所谓“改换门庭”原是实指,寻常人家房门高约七尺,因秀才有了顶子,故家中门框可改为七尺三寸。区区秀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高中进士后,“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无限。

清朝的旗人原以骑射征战为正途,但许多旗人子弟实在眼热因科举而博得功名的汉族读书人。于是,后来参加科考的也有许多旗人。

统治者的需要和读书人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万千读书人争相踏上这条拥挤狭窄的小路。

四

有研究者认为,若无1905年的废除科举,便无1911年的辛亥革命。废除科举,无异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未见刀光剑影,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完成。

“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西行逃难。她于痛定思痛中,如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

就在这一年,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以废科举、兴学校为图存四策之一。

山东巡抚袁世凯则建议:逐年减少科举名额,以学堂的学生名额补充。

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兴学育才的四项主张: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

以上主张均要求以学堂代替科举。

在听取这些奏议的基础上,清政府折中采议:不废科举,但废八股,考试内容改为策论;停试武科取士,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恢复经济特科。

五

1902年的乡试是废除八股文后的首次乡试。

全国共有12省开考。

各省乡试试题有明显改良革新的趋向。

如顺天策论题为:《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

江南试题:《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太学论》。

福建试题:《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湖北试题:《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宗旨论》。

四川试题:《汉置博士弟子论》。

山西试题:《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论》。

河南试题:《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论》。

……

以上考题结合新学时务,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已有现代文官考试题旨的雏形。

1902年1月,清政府委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引进西方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学制,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各省的学堂至此开始设立。

六

朝廷的政令既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应者如云。新学堂和科举的“双轨制”,使这一时期的新学兴办呈现十分尴尬的局面。

1901年11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立山东大学堂。

1902年河南大学堂在开封创立(河南大学堂即后来的开封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并入河南大学)。

全国各地相继开办大学堂约20所。

学堂虽然开办,但科举考试依旧举行。各地官员和士绅对于兴办学堂多持观望态度。众多士子仍然期望在科举中博得功名。

张邃青先生在《记河南高等学堂》中记述:“办学伊始,招生困难。如河南大学堂初设时,由于风气未开,曾通令各县选送学生。无人敢应,乃就乡试落地卷中,选取生员若干名,迫令入学。不至,则由各该县令催送就道。到后,极为优待,不仅没有学费膳费一些名目,并发给膏火津贴,考试奖金。所有应有物品概由学堂供给,参考用书也可以任意求取。”

如此情形不唯河南,所有新开办的学堂都有类似问题。甘肃高等学堂的学生,均以优厚待遇相招徕。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开办数月,学生人数未及拟招收生员的一半。

即使开风气之先的京师大学堂也同样如此。学生们身在学堂,却朝夕苦攻策论。每到会试,学生争赴科考,校舍顿空其半。

1904年开封甲辰会试时,晚清重臣张百熙、荣禄,既是主办新学的学务大臣,又身兼科举会试的总裁总监督。他们试图禁止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赴试,学生则辩白道:大人先生尚且奉旨主试,为何禁止吾辈赴试?大臣们无言以对,只得听之任之。

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曾感叹道:科举不废,学堂断难进步。

七

甲辰会试借闹开封,考的仍然是策论。

这是中国最后一场科举大比,共取进士273名。进士的第一名称会元,会元为谭延闿,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鎤。

说起来,这些人算得上是金字塔尖儿了,可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

殿试结束后,8位阅卷大臣进呈前10名的卷子给皇帝过目。原来排在第一名的是朱汝珍,第二是商衍鎤,刘春霖排在第六名。当年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所以这一年的状元一定要慈禧钦定。

慈禧拿起第一名的卷子,看了一眼,便面露不悦之色。后来有人猜测,是朱汝珍的“珍”字让慈禧联想到珍妃,犯了她的忌讳。这一心中的暗结慈禧不便明说,她只不冷不热地问道:“一个大男人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然后又挑剔其卷面的书写是“重笔”。再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慈禧讨厌广东人,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可巧排在第二名的商衍鎤也来自广东,这是阅卷诸大臣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慈禧继续往后看,一直看到第六本刘春霖的卷子。刘春霖是河北人,先已投了她的心思。加之甲辰那年大旱,春霖这一名字看上去吉利。于是,她便钦点刘春霖为第一名。原来的第一名朱汝珍排到第二,成了榜眼。商衍鎤排名第三,成了探花。会试头名(会元)谭延闿,殿试过后已落到二甲第三十五名。

当然,如同这样钦定状元的事情,前朝已有先例。

乾隆年间的一次大比,殿试第一名原是赵翼。赵翼,阳湖人(今江苏常州),字瓯北。他是后来写出著名《诗论》的诗人,《诗论》中写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殿试的第三名是王杰,陕西韩城人。乾隆读罢前10名的卷子,问阅卷大臣: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大臣答:未曾出过。乾隆说:既如此,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

于是,王杰便中了状元,赵翼改为探花。

八

人们常说,一考定终身。其实也未必。即以赴考开封、取得末科功名的人来说,最后的归宿也各不相同。

清朝覆亡,进入民国。末科状元刘春霖,曾在总统府任秘书,后来以鬻字为生。人们买他的字,亦因慕其前朝状元之名。

榜眼朱汝珍后来亦寂寂无名,不知其所终。探花商衍鎤,被派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宋子文麾下的财政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家文史馆副馆长。

末科进士中,有几位比较有名。汤化龙,民初曾任众议院议长,在当时的政坛十分活跃。

谭延闿是会试的会元,后来亦官运亨通。民国时期先是任湖南都督,后来任职行政院长。

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也是当年的末科进士。

在过去,有了进士出身,就可以直接外放做官。而当年取得进士功名的一些人,在1904年以后,又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

变化虽然缓慢,但变化毕竟在发生。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开始渐渐向学堂培养人才转变。

九

废八股而改策论,是考试内容的重大革新。它更多地需要考生对历史、现实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融会贯通。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学堂,其时务性质课程的设置显出了优势。

南洋公学于1901年春开设“特班”。所谓“特班”,即特设一班,中西兼学。特班共招学生42人。课程包括:英文、数学、格致、史地、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史等等。

特班聘蔡元培先生为总教习。

蔡元培先生重视指导学生读书的方法,为学生制订了修学门类及阅读书目,让学生依次序阅读。他亲自批改学生的读书札记,还经常与学生面谈。黄炎培记得,蔡先生与他们谈话时,或发问,或令其自述对时事的感想,或漫谈新近的读书心得。

在1902年的乡试中，“特班”中选者有12人。黄炎培在这一年江南乡试中榜上有名。黄炎培说：“改八股为策论，许多人做惯八股不会做散文。这一群特班学生散文的锻炼经过了一年半当然没什么困难。江南乡试有一题为：如何收治外法权？特班学生学过万国公法，当然能信笔直书，我就在这上面得了便宜……”

“特班”的学生中，许多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其中包括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

十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统治者感到了强烈的政治危机。原来主张逐年递减科举名额的大臣，也开始主张速废科举。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载：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以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立停科举。他们在奏章中陈情罢科举开学堂之急迫：“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立振作实同一刻千金。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他们陈述此举目的有三：一则在于向各国显示新政改革的决心，风声所树，观听一倾；二则为了消弭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想，使士子不为邪说浮言所惑；三则使进身之路归重学堂，推广学堂，大开民智。

奏折还拟定了废除科举、兴学善后五条事宜：尊经学；崇品行；宜速造就师范；学堂未毕业暂勿率取；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

这份奏折出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更可见废科举立学堂已是大势所趋。

很快，一道上谕由紫禁城中颁布：“著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他强调了中国变革之不易。而废除科举这场制度性的革命，兵不血刃自上而下得以完成，皆因其酝酿时间长，舆论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充分，故全国上下一片平静。

十一

中国的科举制，从公元605年进士科的设置，到1905年的终结，整整经历